

隋唐五代史学



谢保成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隋唐五代史学

谢保成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新登字第 09 号

隋唐五代史学

谢保成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1.5 印张 288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615—0983—9/K · 175

定价:8.80 元

序

郑学檬

我初次认识谢保成同志是在1993年10月召开的国际唐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当时他向会议提交一篇题为《唐代别集中的“文之将史”趋向》的论文。我拜读之后，印象很好。于是在这种以文会友场合，我们因缘相识了。

唐代是盛世，盛世修史，自不待言。所以唐代史学研究是有丰富的资料。现有研究唐代史学的著作如瞿林东同志的《唐代史学论稿》、牛劲功同志的《唐代的史学与“通鉴”》以及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史、史学家评传、隋唐史中的史学部分，都对唐代史学和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作了阐述，富有成果，受到重视。此外，黄永年、贾宪保两先生著的《唐史史料学》亦为了解唐史史料的源流、价值和使用方法的好书。

谢保成同志的《隋唐五代史学》，作为一部系统论述隋唐史学发展的专著，和上述有关著作比较，有自己明显的特色。首先是系统、全面，全书分14章，加上导论、后叙，合计16个部分，集修史、史馆、史学发展等方面内容之大成；其次是有深度，如对隋唐五代主要史著的历史背景、指导思想、修史过程、特点与历史作用，均有详细之探讨，新见迭出。所以，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而且对于隋唐史的研究都是极有参考价值的。

保成同志的《后叙》写得感人肺腑。他的治学态度很严谨，值得称道。这一点从本书对有关史著的内容真伪、存佚情况、版本问题

所作的考辩中可以窥其一斑。

中国现时 50 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大都有一段艰难的经历,所以他们比较成熟,对事业也很勤敬,这和时风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是一群时代的傻子。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属于傻子。”所以,献身敬业的人,是高尚的人。

应作者之嘱,谨此为序。

1994 年 3 月于
厦大敬贤寓所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大规模修史的准备——隋代史学	(5)
第一节 古籍的搜集与整理	(5)
第二节 前代史的续撰	(10)
第三节 皇家垄断国史	(14)
第四节 史料积累的成绩	(20)
第二章 以前王得失为鉴戒的《隋书》等五代史	(27)
第一节 设馆修“五代史”	(27)
第二节 《隋书》的特点与成就	(32)
第三节 南朝梁、陈史	(40)
第四节 北朝齐、周书	(45)
第三章 新修两晋南北朝史	(53)
第一节 “御撰”《晋书》	(53)
第二节 南、北史的编缀	(60)
第四章 史馆制度的确立与调整	(70)
第一节 史馆的建置与构成	(70)
第二节 史料积累制度化	(75)
第三节 几项重要的调整	(83)
第五章 国史的系统修撰	(89)
第一节 实录的纂集	(89)
第二节 “国史”的编撰	(99)
第三节 国史的体制与价值	(104)
第六章 古籍整理与史籍研究	(112)

第一节	古籍整理与著录·····	(112)
第二节	类书地位确立·····	(119)
第三节	几部重要史籍的研究·····	(126)
第七章	古代史学的总结·····	(133)
第一节	《史通》的私撰与结构·····	(133)
第二节	《史通》的思想体系·····	(139)
第三节	刘知几的史学贡献·····	(146)
第八章	史学发展的转折·····	(154)
第一节	中唐以前的史论·····	(154)
第二节	新起《春秋》学的影响·····	(162)
第三节	先期道学对史学的渗透·····	(168)
第四节	中唐之后的史学趋势·····	(175)
第九章	从“礼法刑政”探“政理”的《通典》·····	(182)
第一节	唐代前期的典志·····	(182)
第二节	杜佑创史书编纂新体系·····	(188)
第三节	《通典》的性质与内容·····	(194)
第四节	《通典》的得失与“会要”的萌芽·····	(205)
第十章	图经地志的新发展·····	(210)
第一节	图经总志的绘制与编纂·····	(210)
第二节	《元和郡县图志》·····	(216)
第三节	记一方之志书·····	(223)
第十一章	史学范围进一步扩大·····	(235)
第一节	杂史新著大量涌现·····	(235)
第二节	小说向历史笔记演变·····	(246)
第三节	诏令与奏议的立目著录·····	(258)
第四节	“文之将史”的趋向·····	(265)
第十二章	反映社会风貌的专门著述·····	(279)
第一节	谱牒的官修与私撰·····	(279)

第二节	佛教史籍述要·····	(287)
第三节	乐舞、书画之史·····	(298)
第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唐史修撰·····	(307)
第一节	官修唐史的准备与撰集·····	(307)
第二节	《旧唐书》的编纂特点与思想内容·····	(316)
第三节	数量繁多的私撰唐史·····	(330)
第十四章	五代十国的国史与野史·····	(340)
第一节	史馆制度的延续·····	(340)
第二节	官修国史的纂集·····	(346)
第三节	各国野史的撰录·····	(351)
后 叙:	人生历沧桑 学海治性情·····	(357)

导 论

史学,是运用史料研究和描述人类历史的学科,包括史料的占有、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以及进行史书编纂。总结这一实践而形成的理论,谓之史学理论。研究和叙述史学发展、演进具体过程的学科,称为史学史。世界各国有各国的历史,因而各自有各自的史学。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因而也各自有各自的史学。各个时期史学的相续演进,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

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隋唐五代时期的史学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把握住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上可探史学发生之源,下能见史学演进之流。

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撰成《史记》,成为我国传统史学的开山鼻祖。他提出从“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两个方面考察历史,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既概括了新兴阶级共同关心的问题,又创造了纪传体这一反映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等级制的编纂形式。班固摒弃司马迁的基本思想,认为把西汉历史“编于百王之末”不能“宣汉之美”,抱着申述“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的宗旨,利用《史记》的体例和基本素材,修成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以突出一代政权。随后,适应各政权“推奉正朔,假名窃号”的需要,出现著作官专掌史任。纪传体断代史,逐渐成为南北朝各政权官修前代史的主要形式。在编年体史书不断涌现和其它史籍如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人物传记、地理方志、谱牒、史注、史评等兴起的情况下,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部由经籍中居第三位逐步向仅次于经部过渡。

有隋一代,基本采取禁绝私人修史的方针,开始由官府垄断国

史。但它的古籍整理、前代史续撰和部分史料积累,却为唐初大规模修史作了准备。

唐代前期,随着大一统政权的重建和巩固,史学的地位相应巩固起来。魏征通过整理古籍,撰录了《隋书·经籍志》,对隋以前的史学作出简明而系统的总结,固定了史部在经籍中占居第二的地位,直至清代不改;同时把纪传体史书列为史部之首,使魏晋以来纪传、编年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一转为“正史”独尊。

太宗贞观三年,在唐代史学乃至中国史学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大规模地修撰纪传体前代史,从这一年开始。经过整整30年,修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包括《五代史志》)以及《晋书》、《南史》、《北史》等8部“正史”,占“二十四史”的1/3,完成了由私修向官修的过渡。同时,把以前王得失为鉴戒的史学鉴戒功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实践上对魏晋以来官修前代史进行了总结,影响着此后各朝的官修史。

正式设立史馆,也在贞观三年。经过逐步完善,完整积累史料,系统撰录当代史——实录、国史,成为制度。同时,建立起纂集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的一整套修史程序,贯彻着“圣业鸿勋,咸使详备”,“长悬楷则,以贻劝诫”的撰述宗旨。由此,以纪传体修前代史,设史馆纂集实录、国史等当代史,成为各朝各代基本不变的修史制度。

魏晋南北朝,由于政权更替频繁和外来文化的传入,“独尊儒术”的格局被打破。唐代实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政策,儒学仅取得一席之地。唐初的《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对统一儒学经典作出贡献,并未在思想领域内造成儒学的一统或独尊。由此,非议儒学、疑古惑经,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中唐以前,不少史著或史论,在这一形势下,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反对神学史观和反对是古非今倾向的进步历史认识。

纪传体前代史修撰完成后,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实录、

国史的纂集正在进行中,魏晋以来兴起的各种史书形式也都相应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认识此前的史学,又怎样推动修史的深入,自然而然地提到日程上来。于是,《史通》应运而生。刘知几系统阐述了古代史学发展的历程,适应“正史”独尊的需要,着重分析了纪传体史书的修撰宗旨和体例问题,兼及其它各种史书形式,明确提出“史才三长论”。《史通》由于对司马迁开创、到唐代前期获得完全巩固的传统史学进行了系统总结,并规范了纪传体史书的修撰,因而成为我国史学发展第一阶段终结的标志。

《史通》成书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安史之乱起,潜藏在社会深处的种种矛盾——显露出来,各项制度也都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唐代的历史由“开元盛世”急转而下,跌入动乱之中。

社会的深刻变化,使学术风气为之一大变。经学上变义疏之学为直探经文,出现啖助《春秋》学派,“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文学上变骈文复古文,兴起了古文运动。史学则由于自身的滞后性,发展较经学、文学缓慢,因而受到经学、文学的影响,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啖助学派“从宜救乱”的主旨,为以史经世提供了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它又同韩愈的道统说有着重要的结合点,形成以史治心的主张。

以史经世,杜佑为代表。其“既弊而思变”与啖助学派“救世之弊”的思想是相通的。《通典》之作,一则体现了主通明变的趋向,二则从“礼法刑政”入手,通过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制度沿革探究“政理”,不再局限于对一朝一帝个人作为进行规谏,同时以其历史编纂上的创举,为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史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途,成为经世史学的先导,把中国史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它指责儒家经典“多记空言”、众贤论著缺少“匡拯之方”,要从社会本身探寻救弊之道,所以长期以来对其经世之旨,或“知之者甚稀”,或“习焉不察”,直到传统的政体将要“天崩地解”之际,才闪现出其光亮。

以史治心，即用历史进行伦理纲常教化，以挽救日益腐败的封建统治。啖助学派主张“以史制经，以明王道”，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韩愈提出“治心”为“正心”，“正心”是为治国、齐家、平天下进行个人修养。这种主张在“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很快就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影响远远超过以史经世的主张。史学由探讨治乱兴衰，引以为戒，渐渐转向注重伦理说教和个人内心自省，其教育功用被空前地强化了起来。

在上述学术空气下，编年体史书大兴，通史之风骤起，推进着此后编年体通史及各体通史的长足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在官修国史和前代史这一系列之外，有以《通典》为发端的“三通”、“九通”乃至“十通”系列，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史（包括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系列；史书编著，强调褒贬，讲究义例，出现“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的趋势；地理总志在魏晋以来地理学成就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产生出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元和郡县图志》；历史笔记脱胎于小说家言，形成独立风格，为此后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诏令、奏议开始独立为目，伴着“文之将史”的趋向，与文集一起，愈益受到史学家的青睐；各种反映社会风貌、记述专门之学的著作应运而生，扩大着史学的范围。

五代十国的史学，基本是中唐以后史学的延续。史馆制度有所建树，唐史的修撰成就显著。《旧唐书》在保存唐代一手材料，反映唐代不同时期及五代历史特点方面，有着不可磨灭之功。为保存唐代遗闻轶事，或因唐事为劝戒以示后辈的私修之史，大都能够保存下来。而记述五代十国之事的史籍，无论官修、私撰，流传至今者则为数甚少。

第一章 大规模修史的准备

——隋代史学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建立隋朝,九年(589)南下灭陈,使三国以来 370 年政权分立、民族交融的动荡历史,一转为“混一戎夏”、“无隔华夷”的局面。继隋而起,是统一、强盛的唐帝国。由分裂、动乱到统一、安定,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它使社会呈现出新的生机和繁荣。

这一历史转折,对隋代以及唐初的史学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由于隋政权的短促,未能使这一影响充分展示出来,因而形成了有隋一代史学的独特之处。

多次搜集、整理历史文献,续修前代诸史,为唐初大规模修史和总结史学发展,奠定下基础,这是隋代史学的特点之一。

禁绝私修国史,成为官修纪传体“正史”和实录、国史的先声,这是隋代史学的又一特点。

“表威化之远”的修史思想,在隋代虽然提了出来,却没有来得及完全贯彻到修史之中。只是到了唐初,在大规模的修史实践中才得到充分体现。

第一节 古籍的搜集与整理

古籍的搜集、整理,是历代统治者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史籍的搜集、整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史学活动。

隋代的古籍搜集、整理,不仅是其史学的重要组成,而且在历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隋初,专典经籍的秘书省藏所谓“御书单本”15000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秘书监牛弘以典籍散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认为“经邦立政,在于典谟”,“为国之本,莫此攸先”。文帝采纳这一建议,下诏搜集,“一、二年间,篇籍稍备”。^①

开皇九年(589)平陈之后,晋王杨广令裴矩与高颍收陈图籍。检其所得,多为陈宣帝太建年间之书,纸墨不精,抄写粗拙,但其中有不少缺藏之书或原藏中篇章缺佚者。于是,将秘书省旧藏与平陈所得,“总集编次”,挑出单本。有复本者,则“存为古本”,别除谬误较多的复本。残缺者,用不同本子补续抄全。经过整理,已达3万余卷。

炀帝即位,扩大秘书省编制,校勘典籍,抄写御书。当时西京嘉则殿藏书已达37万卷,炀帝命秘书监柳晋(字顾言)等“诠次除其重复猥杂”,选出精品37000余卷,名为“正御本”,“皆装剪华绮,宝轴锦标”,藏于东都观文殿。其东厢为甲、乙部书,西厢为丙、丁部书。同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抄副工作,将这37000余卷“正御本”缮写50套副本,分为上、中、下三品,分置于西京、东都的官、省、官府。^②

现今可以考知的隋皇家藏书总数,就是唐初所撰录的《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总序中提供的数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平定王世充后,尽收其图书、古物,即隋东都所藏。尽管水运赴长安途中覆舟,“多被漂没”,仍有14466部、89666卷之多。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的唐皇家藏书,也不过82384卷。“历代之

① 上引俱见《隋书》卷四九《牛弘传》。

② 详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玉海》卷五二《隋嘉则殿藏书》。

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①，真实地道出了隋代搜集、整理古籍的成就。

不仅官府多次整理、著录古籍，许多身预其事的个人，也利用这一机会，编著书目。

文帝时两次搜集、整理图籍，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4卷、《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录》4卷，著录于《隋志二》，但无撰录人名。《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两志联用则简称两《唐志》）以《隋开皇四年书目》4卷为牛弘撰，无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却有《隋开皇二十年书目》4卷，王劼撰。姚振宗疑其即《隋志二》所著录《香厨四部目录》4卷。开皇十七年（597）许善心为秘书丞后，以“秘藏图籍尚多淆乱”，“仿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七林》可能毁于隋末战乱，所以《隋志》未有著录。但其“各为总叙，冠于篇首”，“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②的著录方法，对《隋志》是有启示的。

炀帝时搜集、整理图籍，又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9卷，仅见于《隋志》，亦无撰人。按：炀帝即位，柳晋拜秘书监，受命“詮次除其重复猥杂，得正御本”^③，此《正御书目录》当是柳晋等撰录。

最值得注意的是，两《唐志》于《隋开皇二十年书目》之后，都著录了杨松珍《史目》3卷。姚振宗考证：《隋志》子部小说类著录的《解颐》，即《史通·杂述》、《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三》、《直斋书录解题》等著录的《谈薮》，它们所著撰人杨松玠、杨松玠、杨松珍，“当为阳玠松”。^④又据陈振孙著录，《谈薮》2卷，“北齐秘书省正字、北平阳玠松撰，事综南北，时更八代，隋开皇中所述也”^⑤，《史

① 《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

② 《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

③ 《玉海》卷五二《隋嘉则殿藏书》。

④ 《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二（《师石山房丛书》本）。

⑤ 《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

目》3卷亦当为隋代产物。这是第一部见于著录的史书目录,虽然已无法考知它的内容,但仅就专门著录史籍这一点,就有不容忽视的意义,预示史学发展、史籍增多,需要单独著录的趋势。

对于史籍的研究、整理,表明着当时史注、史考的发展。史注的主要成就是对《汉书》的注释、训诂。

注、训《汉书》,“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①萧该,《隋志二》著录其《汉书音义》12卷,又有《范汉音》3卷。包恺“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②《隋志二》著其《汉书音》12卷。此外,于仲文又有《汉书刊繁》30卷。不过,此时对于《汉书》的注、训,完全是循着注经的路数行事的。当时,注经的名家有顾彪、刘焯对《尚书》的注、训,有刘炫对《春秋左氏传》的注、训等。

隋代的史考,要数王劭的《读书记》了。其书不传,仅存清人所辑1卷。据当时的记载,王劭“采摘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卷,时人服其精博”^③。

在隋代编辑的各种书籍中,有一类与古籍整理密切相关,这就是类书。三国魏文帝黄初中“撰集经传,随类相从”^④,出现第一部类书《皇览》。随后,晋、梁、北魏、北齐都有撰集。炀帝时,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类书,在类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长洲玉镜》,炀帝即位初的一部官修类书。《隋书·虞绰传》记其修撰情况:“大业初,(虞绰)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杜宝的《大业杂记》进一步提供了有关这部失传的古类书的情况:1.“大业二年六月,学士秘书监柳顾言、学士著作佐郎王

①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

② 《隋书》卷七五《包恺传》。

③ 《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④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曹等撰《长洲玉镜》一部，四百卷。”明确了成书时间、其他编撰人、该书实际卷数。2. 帝谓顾言曰：“此书源本出自《华林遍略》，然无复可加，事当典要。”说明该书蓝本为南朝梁所编《华林遍略》。3. 柳顾言对曰：“今文籍又富梁朝，是以取事多于《遍略》。然梁朝学士取事，意各不同，至如宝剑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序剑者尽录为剑事，序溪者亦取为溪事，撰玉者亦编为玉事，以此重出，是以卷多，至于《玉镜》则不然。”^① 这表明该书的编纂采事弘富，却无《华林遍略》重复之弊。《隋志三》、《新唐志三》都著录该书为238卷，《旧唐志下》为138卷。其书至宋不传。

《北堂书钞》，虞世南在隋炀帝大业中为秘书郎时所辑。刘悚《隋唐嘉话》记道：“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而《书钞》盛传于代。”虞世南在此前曾参与官修类书《长洲玉镜》的编纂，因而得以博览，加之“后堂群书”，使他以个人力量辑录了这部供作文参考的类书。《隋志三》著录为174卷，两《唐志》俱为173卷，可能少1卷目录。《郡斋读书志·类书类》以其分80部801类。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则以其为160卷，分160门。今本160卷，实分19部851类：帝王22卷75类、后妃4卷26类、政术16卷46类、刑法3卷13类、封爵3卷14类、设官31卷182类、礼仪15卷42类、艺文10卷56类、乐8卷29类、武功14卷61类、衣冠3卷30类、仪饰2卷15类、服饰5卷86类、舟2卷22类、车3卷25类、酒食7卷60类、天4卷25类、岁时4卷28类、地4卷16类。每类中，将群书内有关材料汇集一起，每一事摘出句子，用大字刊刻，而后用小字注其出处、上下文以及相关的解释，间或有虞世南本人的案语，也有全无注语者。由于长期借抄写流传，造成许多混乱，内容、体制也不尽一致。该书成于隋代，所引经籍，多是隋代以前旧本，与唐初所订诸经之本颇有

^① 上引俱见《续谈助》卷四引（《粤雅堂丛书》三编本）。